

小时候，笔者经常听大人说，某某地方烟瘴大，人上去后受不了。河湟花儿也唱道：“拉脊山上的烟瘴大，磨石沟里的水大；我维的花儿是姑娘家，娶过门了闪下。”“阿拉古山上的烟瘴大，大通河里的水大；不说你尕妹的脾气瞎，还说是阿哥的气大。”《三国演义》里诸葛亮南中渡泸水遇到瘴气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唐代诗人胡曾还留下了“五月驱兵入不毛，月明泸水瘴烟高。誓将雄略酬三顾，岂惮征蛮七纵劳。”的诗句。位于青海省曲麻莱县曲麻河乡的长江上游第一个大峡谷，名字就叫烟瘴挂。

从现代医学看烟瘴

烟瘴，历来又名瘴、瘴疠、瘴气、冷瘴、瘴症等。“瘴”字原写作“障”，《说文解字》中释“障”为“隔也”，因为古代的地理区划往往是山川阻隔而形成的。西汉刘安《淮南子·地形训》中讨论了不同气候地理环境对人体的影响，把“障”同“山”“泽”“风”“林”“木”“暑”“寒”等地理气候的自然状态并列，认为不同地区的人们一旦跨越了地理阻隔，便会受“障气”。后来，“瘴气”渐渐取代“障气”，被用来指代一种出现在特定地理气候条件下的疾病。

古人对瘴气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神农本草经》中认为瘴气是一种能令人致病的邪气。南北朝时期，人在西北边疆地区产生的高原反应亦被视作瘴气的一种，称为“冷瘴”。南朝顾野王在《玉篇》中第一次将瘴气当作一种疾病。北宋朝廷组织编纂的《圣济总录》认为“七八月之间，山岚烟雾蛇虺毒之气尤甚，故当是时，瘴疾大作”。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山林中的烟雾和蛇虺毒之气是形成瘴气的原因。明清时期，人们对瘴气的地域特点、形成要素等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进入20世纪，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所谓的烟瘴、瘴气，在古代南方是以疟疾为主的热带病；在青海、西藏等地区则是以高原反应为主的高原病。我国岭南地区及西南边疆的热带、亚热带地区山高林密，雨水丰沛，高湿高热的气候环境再加上死亡动植物的腐烂，容易滋生各种细菌和有害气体，以至于山川林木间盘郁聚集着危害人体健康的雾气——瘴气。于是，古人便认为疟疾是由这瘴气引起的，而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山脉纵横，峰峦叠嶂，境内有祁连

漫谈“烟瘴”

□ 刘玮



高寒缺氧、人迹罕至的高原地区，却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

同海元 摄

山、昆仑山、阿尼玛卿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等高山横亘，平均海拔在几千米，自然成为高原病——烟瘴的高发地区。高原病是发生在高海拔低氧环境下的一种特发性疾病，其发病基础是低氧导致的病理生理改变，根据发病急缓程度可以分为急性、慢性两大类，其中发病率最高的是急性高原病。急性高原病是指人群在从低海拔地区进入高海拔地区时，因缺氧而出现的以头痛为主，并伴有头晕、恶心呕吐、心慌、失眠、食欲减退、疲劳乏力等症状的病症。

史籍中高原地区的烟瘴

爬梳史籍，发现其中不乏对高原病的记载。《汉书·西域传》在谈到汉武帝时期罽宾国的交通时写道：“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据考证，“大头痛山、小头痛山”在今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西南。这里所记载的“身

热无色，头痛呕吐”等症状就是高原反应。《魏书·高宗纪》记载，北魏和平元年（460年），文成皇帝拓跋濬“诏征西大将军阳平王新成等督统万、高平诸军出南道，南郡公李惠等督凉州诸军出北道，讨吐谷浑拾寅……九月，诸军济河追之，遇瘴气，多有疫疾，乃引军还。”这里北魏军队所遇到的“瘴气”也是高原病。《南齐书》中说河南匈奴地“辄有障气，使人断气，牛马得之，疲汗不能行”。这里的“河南匈奴地”指的就是位于今甘肃、青海黄河以南之地，这些症状都是高原病的症状。《北史》中记载了隋煖煖曾于大业五年（609年）亲征吐谷浑，武威太守樊子盖“以彼多瘴气，献青木香御雾露”。唐代杜佑《通典·边防典六》记载吐蕃地理时写道：“地有冷瘴，令人气急，不甚为害。”成书于乾隆年间的《卫藏通志》中把高原病称为“瘴气、瘴疠、烟瘴、葛仓（藏语，意即头痛）”等。纪晓岚在《河源纪略》中提

到积石山时，说这里“积雪成冰，历年不消，峰亦皆白，形势险峻，瘴气甚重，人罕登陟”。

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唐朝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左卫员外大将军阿史那道真、右卫将军郭待封，以十万大军远征吐蕃，最终在大非川战役（今海南州共和县切吉草原）中全军覆没。大非川战役失利固然有郭待封“多违制度”等主观原因，但客观上，薛仁贵所率十万人马几乎全部来自低海拔地区，短时间内进入高原作战，最容易发生高原反应。更何况薛仁贵指挥部队“轻锐倍道”，大军缺乏逐步适应高原环境的时间，更增加了发生高原病的概率，作战能力势必会大打折扣。大非川惨败后，唐高宗对薛仁贵说：“有人云，卿鸟海城下自不击贼，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皇帝对薛仁贵不主动出击这一点耿耿于怀。

现在看来，薛仁贵当时之所以消极避战，很有可能是因为唐军队伍中发生了高原反应。即使他有心与吐蕃军队决一死战，客观条件也不允许。

高原病的一系列症状都是由于高海拔和缺氧而出现的。但直到1774年英国化学家普里斯特利才发现了氧气，1778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才正式命名了氧气。同治十年（1871年），清末科学家巨臣徐寿在《化学鉴原》一书中才第一次把氧气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当时译作“养气”）。因此古代人无法正确认识高原病，也在情理之中。20世纪以来，国人开始逐渐认识和了解高原病。1914年，河湟名士周希武奉派前往玉树查勘界务，并调查甘川藏边界纠纷，随后写成了《玉树调查记》一书。书中写道：“十一月十三日，即旧历九月二十六日，信宿黄河南岸……古人述出塞之苦，李陵《答苏武书》及《吊古战场文》约

略尽之，而此次行役之苦，则有较古人所言尤甚者……空气稀薄，举动辄气喘不止，则古人所未言也。”由此可见，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周希武，此时已知道出现高原反应的原因是“空气稀薄”。

烟瘴之地与古代刑罚

烟瘴还体现在古代的刑罚当中。尤其是明清时期，烟瘴之地常被作为发配重犯的地方。明代《刑令》中规定，凡是官员贪污被判流刑的，都要发配至南方的龙南、安远、汀州、漳州等烟瘴之地，而这些烟瘴地附近州府有人贪污的均发配至北部边塞处所。可见烟瘴与极边一样，成为流刑中最重的刑罚。清代的充军刑罚由轻至重依次分为附近、近边、边远、极边、烟瘴五等，距离远近各有不同，附近为两千里，近边为二千五百里，边远为三千里，极边、烟瘴俱四千里。将犯人发往云贵两广等地的烟瘴之地充军，成为清代充军刑罚中最重的一等。

正是由于烟瘴给古人造成的心灵恐惧，导致许多官员将边疆地区的烟瘴之地视为畏途。针对这种情况，清朝在南方边疆烟瘴地区设置了“烟瘴缺”，由封疆大吏直接任用得力官员，不必参加吏部铨选。不得不说，烟瘴缺是为适应边疆烟瘴地区特殊自然环境而进行的一项制度创新，从而成功破解了清代边疆治理的难题。

值得一提的是，曾两任西宁道、在河湟地区留下颇多政绩的一代名臣杨应琚，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由陕甘总督调任云贵总督，督师对缅战争。已到古稀之年的杨应琚误判了战争形势，低估了缅甸贡榜王朝的实力，并且在战败后屡屡谎报军情，虚报战功。不久，乾隆帝派亲信侍卫福灵安前往云南前线了解情况。得知真实战况的乾隆帝震怒震怒，以“调度乖方，有心欺罔”的罪名，将杨应琚逮捕进京并赐死。在清军的对缅作战中，烟瘴等与地理有关的因素是影响战局的重要不利条件之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在雍正、乾隆两朝一直被视为能臣的杨应琚的死，与中缅边境的烟瘴不无关系。

时至今日，随着高原医学的发展，人们对急性高原病有了清晰的科学认知，也有了很多医学上的应对方法。烟瘴，失去了神秘的面纱，人们再也不像古人那样对它谈虎色变了。

（来源：青海日报）

壮丽辉煌柴达木

□ 王浩

在时光的长河中，海西州以它独有的坚韧与辉煌，悄然步入了七十载的华诞。

这是一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每一粒沙石都镌刻着岁月的痕迹，每一缕风都携带着过往与未来的对话。

七十载风华

在那遥远的西部高原，有一片被阳光深情拥抱的广袤之地——海西州，她以山的巍峨、湖的宁静、沙的广袤，诉说着七十年的沧桑巨变。

岁月悠悠，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淌过历史的沟壑，滋养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也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辉煌。

晨曦初照

在那遥远的西部高原，有一片被阳光深情拥抱的广袤之地——海西州，她以山的巍峨、湖的宁静、沙的广袤，诉说着七十年的沧桑巨变。

岁月悠悠，如同一条蜿蜒的河，流淌过历史的沟壑，滋养了这片神奇的土地，也见证了她的成长与辉煌。

岁月如歌

山川不语，却是最忠实的见证者。昆仑山的巍峨，柴达木盆地的辽阔，都默默记录着海西州七十年来的风雨兼程。从荒芜到繁荣，从发展到跨越，每一步都凝聚着海西儿女的智慧与汗水。他们用双手创造奇迹，用心灵守护家园，让这片土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绿色发展

在追求发展的道路上，海西州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将生态保护放在首位。盐湖的碧波荡漾，草原的绿意盎然，都是她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最好证明。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绘制了一幅幅生态文明建设的美丽画卷。

民族团结

文化是海西州的灵魂，民族团结是她的根基。七十年来，海西州在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积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土地上，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书写着民族团结进步的新篇章。

信心满满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海西州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决心，迈向更加辉煌的明天。她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加坚实的步伐走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我们相信，未来的海西州定将更加繁荣昌盛、美丽和谐！

地理、神话与文化意义上的昆仑

□ 刘大伟

地理学意义上的昆仑山西起帕米尔高原，绵延2500多公里，自西向东覆盖了新疆、西藏部分地区，横贯青海全境，一直延伸到甘肃、青海和四川三省交汇处，整个山系囊括了喀喇昆仑山、巴颜喀拉山、阿尼玛卿山和祁连山等诸多山脉，因之被称为“群山之祖，万山之宗”。雄浑的昆仑山绵延千里，高耸入云，极易引发人们的遐思奇想。在中国古代神话中，昆仑山就是神秘的“天梯”，经由这个“天梯”，仙界与人间有了联系。《山海经》称昆仑山上有天帝的宫阙，众神、灵兽和奇花异草汇聚在这里，正因如此，创世神话中的盘古、伏羲、女娲以及洪水神话中的鲧、禹等神祇都有了一个共同的“昆仑”身份背景。除此之外，一些文献典籍中也屡有“赫赫我祖，来自昆仑”的重要论断。从这些记述可知，我们的先祖一直在追寻自己的民族之根，“来自昆仑”的肯定性回答实质上将地理学维度上的昆仑提升到了文化与文明的意义层级。

毋庸置疑，人类文明诞生的一个重要条件是河流。譬如我们要谈古巴比伦文明，就得谈到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了解古埃及文明，定然绕不开尼罗河；谈及古印度文明，需要理解恒河的存在意义。我们探寻古老的中华文明，必定要去关注到黄河及另外两条重要河流。那么这三条河流究竟来自何处？与神话和文化学视野中的昆仑有着怎样的关联？翻开先秦文献，“河出昆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的说法屡见不鲜。由此人们认为：黄河发源于昆仑山，若要寻访昆仑，需要沿着黄河溯源而上。基于这样的认识和考虑，千百年来人们以黄河为基准，千里迢迢来寻访昆仑山。不管是王侯将相还是僧侣文人，都将自己探访昆仑的艰辛和见闻写进了诗文，并流传后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诗仙李白的一声慨叹，道尽了古人对黄河的诸多遐想。尽管他们不甚明了这条河流的源头，但他们坚信，养育了华夏儿女的黄河是一条伟大之河，其源头必定悠远、纯洁而神圣——不妨将其理解为“从最高的地方来”，而高可入

天的地方就是神话中的“天梯”昆仑。众所周知，现实地理中的黄河源头在巴颜喀拉山下。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将神话中的昆仑与地理中的昆仑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能够讲得通的事实逻辑，那就是黄河源头在巴颜喀拉山下，而巴颜喀拉山就是昆仑山系中的一座重要山脉，故而“河出昆仑”的说法没有问题。

不仅是黄河，长江、澜沧江都要顺着山势分别向东、南两个方向奔流而去，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支流携带不同的土质和多样的文化因子，不断注入三条主河，增加其流量的同时，也赋予其根性与母性的文化意蕴。从这个角度而言，古代先民对昆仑以及民族之根的寻访，其文化价值显然要大于地理意义，因为这不仅是一种对理想精神的追寻，更是一种神话文化的体验。三条自然之河，同时也是三条文化之河，在它们各自蜿蜒流淌的过程中，滋养着流域内的多种生命样态，甚至将中华文明的气息送到了异域他国。

在这个有山有水也有人类活动的大文化语境中，我们理解了祖先讲述的昆仑神话及其意义所指，譬如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等神话故事，其意义指向是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大胆想象；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和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详细记述，而燧人取火、仓颉造字、神农尝百草等神话故事，则突出了“文化的诞生”以及先民身上萌生的文明意识。在我看来，人类文化存在并演进的方式之一是：先有神话史诗，后有传说历史。如果我们将神话中的昆仑逐渐还原为现实地理中的昆仑时，具有源头性质的昆仑文化实际上已然具备了“人类文明摇篮”的显著特征。

可以这样认为，西王母是掌管生死的女神，也有可能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女王，那么青海历史上是否存有“西王母国”？地理学典籍《禹贡》里有“昆仑之国”“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的记载。意思是说，身穿兽皮衣服的昆仑、析支、渠搜等西部羌戎部落都归向中原，出现过边疆安宁的局面。学界一般认为，昆仑、析支、渠搜等部都在以青海湖为中心的青海境内。此处的“昆仑”大概就是指所谓的“西王母国”了。在《穆天子传》里，周穆王曾西巡昆仑、拜会西王母并与这位女王宴饮赋诗，此段记载究竟是一个美丽的神话还是一段真实的历史？学者们见仁见智，各有说法，但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这是一段被神话化了的富有传奇色彩的历史，周穆王拜会西王母的地方就在青海湖一带。

有专家认为，西王母国当时的“国都”就在青海湖西畔的今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天峻县一带，其疆域包括今天的昆仑、祁连两大山脉相夹的广袤地带，青海湖环湖草原、柴达木盆地是其最为富庶的中心区域。文物考古工作者还在天峻县西南20公里处发现了西王母国女首领的居所，已命名为“西王母石室”，并在此发掘出刻有“长乐未央”“常乐万岁”铭文的汉瓦当，或可证明早在汉代，人们已公认这个石室与西王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此外，汉代学者王充就明确地把青海湖一带称为“西王母国”，这一提法对学者们的研究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特别是专家学者们对历经两千年风雨的西海郡虎符石碑反复研究后，认为石碑上的虎就是西王母的象征（西王母国以虎为图腾）。

查阅古籍，我们知道虎是羌人的图腾，而神话中的西王母曾以羌人女王的身份出现在我们的记忆里，而且也是以虎为图腾的。在古汉语里，“虎”的前身叫“於菟”，最早把老虎叫作“於菟”的是先秦西部羌人，后来流行于楚地。而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年都乎乡年都乎村，每年要举行一种叫作“跳於菟”的民俗活动。活动的核心是7名未着上衣，脸部和上身涂有老虎斑纹的青年男子，他们被称作“於菟”，承担着带走全村瘟疫邪魔的重任。从这些民俗遗踪中，或可听到有关西王母和昆仑神话的古老回声。

可以看到，从神话传说到地方历史，从文化遗存到民俗展演，昆仑已然具有了地理、神话、民俗等因素相互交织着的复杂形态，实质上这也是作为符号的昆仑已然沉淀并转化为文化昆仑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昆仑是一个文化符号和意象，那么昆仑神话就是我们的文化母题和精神高地；如果说昆仑是一座自然意义上的大山，那么围绕着这个山体的河流与所有的生命体，都会在经受时间的沉淀和人类文化的选择后，以丰富的精神样态进入具有源头性质和包容气度的昆仑文化。（来源：青海日报）